

费孝通民族研究:注重从历史角度探讨民族交融

免平清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和共同繁荣,必须共同走现代化的开放道路,在保持各民族特点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内部的融合会日益加强。

在民族研究方面,费孝通经历了从质疑“中华民族是一个”到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思想演变过程,他早期主要是从体质、文化、语言等方面研究特定民族,后来逐步转向更注重从历史和民族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各民族交往交融、中华民族的凝聚与国家统一等问题,费孝通由此也成为民族研究理论自觉的典范。

各民族的文化、语言、体质差异较大

1930年代末,从英国学成归来的费孝通,曾与顾颉刚就“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题展开过一场辩论。在日本全面侵华、中国面临严重民族危机之际,曾经致力于打破“华夏偶像”和中国民族“同种”神话的史学家顾颉刚提出并论证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认为凡是中国人都属于中华民族,大家要集合在“中华民族”之下,团结起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顾颉刚不只是出于时局与政治的需要提出这一理论,更是自觉地从学理层面挖掘与分析中国二千多年来各民族在血统方面相互融合、文化方面相互借鉴以及人们心向统一、民族意识日益趋同的历史实践。而费孝通则从欧美人类学的视角,结合自己在广西大瑶山的体质人类学调查,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提出质疑,认为中国境内不仅有五大民族,而且还有许多人数较少的民族,中国人在文化、语言、体质上有很大的差异,要谋求政治上的统一,不是要消除各民族及经济集团之间的界限,而是要消除这些界限所引起的不平等。虽然两人的观点和立场不同,但顾颉刚注重挖掘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主题,致力于推动现代民族国家“政治的统一”与“心理的统一”的民族研究立场,无疑对费孝通产生了很大的触动。费孝通后来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其思路和依据的史料,与顾颉刚论证“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参与了党和国家旨在实现各民族平等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调查研究与实践。从1952年开始,费孝通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的教学与研究经历,以及他的同事兼师长潘光旦注重从几千年来我国各民族之间接触、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过程而不是孤立地研究某一民族的历史这一研究立场和主张,对费孝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开始反思民族识别和民族社会调查中只是以一个个少数民族为对象进行分别调查的方法,也更为注重思考多民族国家中“多”与“一”的关系,即如何看待国内各个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保持各民族特点的基础上促进民族融合

改革开放后,费孝通越来越认识到,把各个民族孤立起来研究的方法,已不适应我国新形势的发展。他认为,要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和共同繁荣,必须共同走现代化的开放道路,在保持各民族特点的基础上,共同的东西必然会日益增加,中华民族内部的融合会日益加强,在这一融合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防止大民族主义,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地方民族主义,这也是民族研究工作者的责任。费孝通注重将微观的民族社区调查与区域或中华民族宏观层次的研究相结合,他的研究由此也更具全局意识与理论关怀。在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时,他通过挖掘历史上各民族长期沿河流或山脉迁徙、流动的路线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民族相互依赖与交融的历史与文化资源,提出了“民族走廊”概念,以此作为发展民族和地区之间经济合作的基础。在这些自觉的理论思考与调查研究过程中,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由“自在的民族实体”到“自觉的民族实体”和各民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融合关系形成的历史过程与现实。

关于费孝通的多元一体理论，有不少讨论，如有分析认为多元一体论是一种静态的结构论视角，并没有突出中华民族当前的过程与任务仍然是从多元走向一体。实际上，费孝通并不认为他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已经完成，他希望它是开放性的，今后仍需持续地进行研究和探索，他希望自己的理论能让大家“更自觉地为中华民族作出贡献”。但是，当前我国有些学者受西方多元文化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将多元文化主义视为多民族社会良性发展的理想基础，忽视多元文化主义产生的欧美移民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基础，忽视多元文化主义并未带来族群间实质性平等，反而造成族群纷争和国家认同困境的事实，更无视中国各民族之间交往和交融的漫长历史与现实过程。甚至有人将费孝通的多元一体理论等同于多元文化主义。这些观点和立场，与费孝通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在利益分化、价值多样化的时代，思想价值观念的差异性或多元化是一种事实存在，但国家文化精神层面的意识形态则必须要有主导思想，这是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有的理论自觉。在民族研究中，我们更需要保持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始终要将促进各民族之间交往交融和民族团结、促进多民族国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作为研究的立场和宗旨。